



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○当代新诗话 主编 沈奇

为世界文身

○于坚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为世界文身

于坚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· 西安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世界文身 / 于坚著. —西安: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5. 5

(当代新诗话 / 沈奇主编)

ISBN 978-7-5450-3642-8

I. ①为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诗歌评论—中国—当代—文集 IV. ①I207.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1796 号

WEI SHI JIE WENSHEN

为世界文身

于 坚 著

出 版 人 黄平利

策 划 田和平 马晓侠

责任编辑 田和平

责任校对 刘洪强

装帧设计 沈 斌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(西安市丈八五路 58 号 邮编:710077)

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0-3642-8

定 价 36.00 元

“回到汉语的原始神性”

——读《为世界文身》感言

宋宁刚

“诗话”之于中国诗学，由来已久，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汉语“范儿”的论诗文字。虽然近代以来，比照西方来批评汉语思想缺乏“逻辑”与“系统”者屡见不鲜，但百年之后重新回首，这种注重直感与一己体悟的“玉屑”式言说，确然是最直接、最诗性的，也是最中国、最汉语的；一如中国诗歌的源头是简洁、单纯、天真、浑朴的“诗三百”，而不是具有宏大叙事系统的“史诗”。“诗话”并不必然是印象式的、随意的，它完全可能是从纯正的趣味而来的精微辨析和严肃的审美判断，只是经过“提纯”“萃取”，不同程度地省却了逻辑上的论证与过渡。毋庸讳言，正如汉语向来具有那种直指人心的豁然与疏朗，“诗话”之作为关于诗的言说，更能直指诗的当下，也更能体现汉语的魅力与神性。可惜，在“扶东倒西”的百年浪潮中，这些都被遮蔽、掩埋得几乎难以辨识了。

阅读当代作家关于写作的一些自述文字（包括严肃的访谈和笔谈），常常会感到一种整体性的、对自身写作之省思的

乏力，仿佛我们的作家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写作，也不知道写作何谓、何为。也因此，我期待看到现代汉语语境下的“诗人的诗话”，看到当代诗人对于诗的重新理解与申说：对“写诗”这种行为本身的思考、对诗歌文本的审美和判断、对自己写作的反思……总之，是期待看到关乎诗的开人耳目、廓人心胸的慧见。我以为，这是最能体现一个诗人的素质，也是应当由诗人来承担的义务之一，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空前需要写作自觉的时代。

终于，因缘际会，我得以从诗人、诗评家沈奇先生（他是“当代新诗话”丛书的主编）处看到作为丛书之一种的“于坚诗话”的原始文字：它们或为诗学随笔，或为诗学访谈，都是诗人于坚近年来关于诗及诗学的个人“断想”。其中一小部分文字，我从于坚新近的随笔集《还乡的可能性》（商务印书馆，2013）中已读过，多数文字，则是首次见到。经沈奇先生举荐并得到于坚的同意，我有幸参与了“于坚诗话”初稿的摘录与集成工作，历经数月而成初稿，复呈于坚先生校勘修编定稿。由此，我也成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。

抛开个人趣味与好恶，放眼当代汉语诗界，于坚的存在，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。无论其诗歌的艺术性，还是对当代诗歌“场”的拓展与平衡，于坚及其诗作都不容忽视。我没有说“史”，而只说“场”，因为“当代”作为一个时间段还是太短。也因为“场”更能说明于坚对于当代诗歌的“现场感”和“在场”意义，而非对于坚诗歌的位置有犹豫。相反，这是基于认真考量后的严肃判断：一方面，作为旁观者，对从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至今三十多年的审视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普通读者、一

个后辈的诗歌学习者,通过阅读于坚的诗歌作品所下的判断。

犹记十几年前,还在念中学的我,读到于坚文字时的惊奇与喜悦。那时,我还不知道于坚是谁,只觉得是一种纯然源于文字的惊喜,激醒了自己稚嫩的生命。十多年来,我断断续续阅读着这位在年龄和精神上都属师长辈的文字,聆听他来自高原的声音。如今,借着系统阅读原文和潜心摘编初稿的机会,重新打量,仿佛穿行于光与影、熟悉与陌生不断斑驳交替的山林,从头至尾,受着感发,又不乏启示。

作为“诗话”,自然首先涉及:何为诗?何为写作?对此,于坚有许多精彩表述。

比如,诗是“为世界文身”,是对世界的一种“抚摸”,是对世界之黑暗的照亮;“诗是一种记忆,这种记忆不是意义的记忆,而是写作技艺的记忆,是对赋比兴的记忆”,“在中国文化里,赋比兴就是那种可以使我们在黑暗中重建故乡、时间,重建‘无’的技艺”;“中国的宗教方式是文明,以文照亮世界之蒙昧、黑暗。文章为天地立心,诗人是文明的祭司,最高守护者。诗人把握着汉语的最高水准,汉语的自由、丰富、永恒魅力”……

比如,写作“是为世界守成,是‘无’的守护者,是随物赋形”;写作是“跟黑暗对话”,“是我们捕捉‘黑暗’这个野兽的过程。但是那个东西,并不是真实的所谓的‘黑暗’,而是一种‘不明’”;写作“应当是某种非血缘的‘世袭’……‘经国之大业’只在写作内部,而不是背叛写作的借口”……

在于坚看来,写作(诗)之于当代的意义在于:“时代缺乏诗意,但诗活着。”可以说,时代越是缺乏诗意,诗就越是有力量。

地活着，它是这个世界的绿色，给生存以意义，并“只对文明负责”。于坚说，“我非常迷信‘道法自然’”，“我的写作，就是要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的常德，就是要回到一种神性”。也许有人 would 感到惊奇和疑惑：于坚不是“先锋”和“世俗化”写作的代表么？怎么称自己的写作是“道法自然”，目标是“为天地立心”，要回到“常德”，回到“仁义礼智信”？

不妨先来看看于坚的“诗路自述”。他的诗歌阅读，从王维、李白、杜甫开始，到惠特曼：“像王维，我不是把他看作已经死掉的古典的诗人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生活在昆明的，他写的‘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’这样的世界就在我身边，触目皆是”；“在惠特曼到来之前，王维是最热爱的诗人。惠特曼带来了另一种光，汉语在他的诗歌里成为辽阔的、自由的、狂野的，激情澎湃、无拘无束”。如此，我们便不难理解，于坚何以会推崇“篇终接浑茫”和“大块假我以文章”式的写作，并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践行而独备格局。

从古典到现代，先中国后西方，并非每个当代诗人都有幸沿着这条阅读和精神成长的路线行进。相反，很多人进入诗歌，是直接从翻译作品的阅读开始的（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？）。于坚诗路取向——更为准确地说，他对诗与生活之亲密性的绝早体认，使得他的诗与生活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谐和感、一致性，既呈现了生活的广度，又展现了生命的立场、态度与深度，甚至因此而造成了他的“先锋”和被误读。

关于于坚的早期作品，如《尚义街六号》，很多评论家说那是对世俗生活、对小人物的描写与观照。而在于坚看来，这是

莫大的误解。“实际上,这首诗受的是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的影响”,意图是“把日常生活神圣化”：“八仙都是李白的朋友,是普通人。我写《尚义街六号》,我的那些朋友也是。汉语本身就有神性的力量,把一个活着的人写到诗歌里面去,等于你要把他变成诗教的一部分。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升华。”这番自我解释之具有矫正视听的作用,并非由于其出自作者而具有“权威”,而是因为此种诗歌观念本身的认知高度和具有的启示意义。如果我们能够想起宗白华等老一辈学者揭橥中国传统文人将生活“审美化”的努力,就不难理解何为“把日常生活神圣化”,也会对于坚诗中的生活元素多几分领会与亲近。进一步说,这里对日常神性的阐发,何尝不是对失落已久的汉语神性的揭示与高扬?

与此相关的是:何谓神性?习惯了西方基督话语中的“神”的概念,不自觉地就会将日常(所谓“世俗”)与神性相对立。而在于坚看来,此种观念,在汉语诗歌语境中,只会导致“观念神性”：“以为神圣的东西就是要用所谓神性的语言来写。那是一种观念神性。”反观自己,他不无自豪地说:“我的写作不是观念神性。我的升华不是赋予这些人物神性的观念,而是通过对他们的命名,通过汉字本身的力量,让他们具有神性。”举例来说,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,“它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,并没有说神仙在此。但是汪伦因此而不可朽。把‘汪伦’这两个字写到诗里面,本身就是不得了的事情。它依靠的是语言本身的力量。如果你写的这首诗是即将不朽的,那么这个人也跟着你的诗成为神仙”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他批评当代一些诗人笔下的“神性”,“是受西方文化影

响的神性”。这种神性之所以是肤浅的,在于其中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之根。

如此诗学论断,不仅是对一些固化批评的纠正,也是对汉诗写作的有益启示。对于置身汉语中的我们重思“何谓汉语的神性”、何谓属于汉语世界的神性,更是不无启迪。

与此类似的,还有对“拒绝隐喻”(提到于坚,这个诗学观点几乎无从回避)的阐述。在于坚看来,“拒绝隐喻”并不是一些批评家所谓的“策略”,诗人也不是阴谋家;“世界的根源在语言……我觉得应该从一种具体的写作入手,在写作的具体过程中来改变传统诗歌的方法,通过对语言的怀疑来重建对语言的信任,拒绝隐喻是一个方法,而不是颠覆。颠覆隐喻意味着颠覆汉语存在方式”;拒绝隐喻,“就是要在语言上回到‘直接就是’,回到那种汉语的原始神性”。这番深含现象学意味的话,对于理解于坚,实在是不可或缺的。它不仅有助于人们消除误解和无益的误读,更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语言,理解生活本身。

很难想象,如果不是在应机而发、吉光片羽式的诗话(包括访谈和诗学随笔)中,看到这些灵光闪现的颖悟之思和珍贵的诗之言说,我们还能在何处与它们相遇?就此而言,我们更加期待,以沈奇先生倾力促成的“当代新诗话”这一丛书为起点,首先经过诗人和诗的真正品评者之努力,逐渐恢复汉语诗话的传统,恢复属于汉语的那份独特魅力与神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“当代新诗话”之为“新”,既在开拓现代诗之诗话,也是在赓续一种悠久的诗性传统,并由此拓展汉语诗论的话语体系,也重新提醒诗话对于汉语诗论的文体意义。

回到“于坚诗话”。除了上述丰富的诗学观点，我们还能看到诗人于坚身上的宝贵品质：切近与“平视”。他从不“迷信”西方，从不无条件地“膜拜”什么。这一点，既体现于他对“观念神学”的反思，也体现在他对燕卜苏著作的批评，对凯鲁亚克、金斯堡、阿什伯利等人的论断中；同时，还体现在他对当代文化语境下一些现实问题的直面与关切。他的这些关切，既是出于诗人的良知，也是由关注“日常生活的神性”自然所及。与此相应的，是他努力以诗歌的方式对现实关切之文本化的深刻表现。

这也提醒我们，于坚的诗话与他的诗之间具有强烈的互文性。它所散发的诗意光芒与洞见，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于坚的诗，更有助于理解诗歌本身。当然，还有他的激情、恳切与诚实。这一点，只消打开书，就能深切感受到。

2014年秋于西安财经学院

【宋宁刚，文学博士，现任教于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】

目 录

“回到汉语的原始神性”

——读《为世界文身》感言/宋宁刚	1
I 说道法自然	001
II 说诗人与诗	015
III 说诗歌写作	052
IV 说诗与日常神性	083
V 说诗歌语言与汉语诗性	098
VI 说中西诗学差异	109
VII 说时代与现代性	123
VIII 说口语、方言与诗	142
IX 说诗的发表、传播及网络	149
X 说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	156
XI 说自己与自己的作品	164
XII 说他人与他人的作品	216
XIII 说余或杂说	232
后记	250

I 说道法自然

1

如果西方文化在终极价值上更关心上帝彼岸的话，那么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则和与生俱来的生态、此在息息相关。

所谓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。

这个美不仅是审美之美，更是存在的根基。

2

《易》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。

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道法自然，追求天人合一。在中国文明中，自然不是人的征服开发对象，而是道之所系。中国过去的文明，无不是道法自然的结果。老子、庄子的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，尤其对于人生。

如果儒家思想更偏重于影响中国的政治传统与道德谱系的话，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则支持了中国的哲学、文学、艺术以及更广阔的人生世界。

回忆一下汉语诗歌的历史，其核心就是道法自然。

3

伟大的汉语诗人无不是自然诗人。

赞美大地的山水诗在中国是一个悠久传统。

李白说：大块假我以文章。没有大地，何来文章？何来中国文明？道法自然是中国几千年来所坚持的将诗与居天人合一化的生活之流。

4

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，过去是中国文明各种灵感的源泉，生活的常识。而今天，这个伟大的思想已经成为黑暗中的圣经了。

5

中国的宗教方式是文明，以文照亮世界之蒙昧、黑暗。

文章为天地立心，诗人是文明的祭司、最高守护者。诗人把握着汉语的最高水准，汉语的自由、丰富、永恒魅力。

6

人类也许已经聪明到可以创造出完全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“大地”，克隆虚拟出全新的人类。但过去时代的文明、真

理、意识形态、语言——其赖以存在的经验(生活经验、审美经验、感受方式等等)也将失效。

我对在全新的生态系统下用新世界的语言写作毫无信心,我的写作信心建立在对过去数千年世界文明经验的信任上,在这一点上,我是顽固的守旧者。

7

写作,就是道法自然的语言创造。

过去五千年中国的文学无不是所谓“生态”文学。自然没有在哪一个民族的文学中曾经占有如此广泛、深刻的位置。

8

道法自然不仅仅是题材。

道法自然是汉语文人的根本写作立场。

9

天籁,是汉语写作的最高境界。

10

诗是我们时代最后的自由领域……诗不是信仰,但它可以激活我们对自由和信仰的记忆、激情。它可以为我们这个

意义缺席的时代给出存在的意义，召唤隐匿的诸神。

11

在今天，诗所隐藏的神性、宗教性日益彰显。

在诗性张扬的时代，例如唐朝，神性是隐匿在语言中的。但是在诗意匮乏的时代，诗的神性必须出场，这是一个屈原的时代，招魂是诗人的使命。今天，诗歌重新成为那些追求伟大、自以为“天降大任”的人们的事业。

12

我并非刻意地将日常事物作为诗歌题材，很自然的事情，我是在人生里面的诗人。

我没有这个世纪许多诗人中普遍的“比你较为神圣”的优越感。人生不就是每一日的日常生活么。诗教是自古的传统，诗歌承担着类似宗教的责任，但这个天命在诗人那里处理不好，就容易自我神化、装神弄鬼、小巫。

20 世纪，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，许多诗人企图扮演上帝了，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的伟大在于，文章为天地立心，传神。但诗人自己并不是唯我独尊的上帝。20 世纪诗人中流行的自我表现，其实就是自我神化。

如果道法自然，上帝就是做作。

《圣经·创世纪》的第一段就说：“起初，神创造大地。地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见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”

光为什么是好，暗为什么就是不好，这是对存在的怀疑，是不信。暗从此成为需要改造、解放、消灭的部分，这把西方引向了追求明，追求清楚、确定性、分析。世界分成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等等。

中国不同，太极图是阴阳合一的。

“世间一切皆诗”是诗人们的一个出发点，但不仅仅是诗人的出发点，也是古代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基本点。

“世间一切皆诗”来自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，与西方的天堂地狱的划分不同。有了“世间一切皆诗”的认识，才有天人合一。如果对世界持的是否定的、改造的、拯救者、解放者、革命者、救世主的态度，人是不可能与天合一的。

“世间一切皆诗”是中国诗人的一个写作立场，也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立场。在此立场上，我们才出发作为诗人。

大地、世界、人生本来就是诗意的，诗意是先验的。没有诗歌它们也存在于诗意中。但这个诗意是被隐匿在自然中的，语言把诗意敞开。

诗就是文化，以文去化。天人合一，如何一，通过文来“道法自然”，化为一。

我们都是屈原意义上的诗人，“去终古之所居”，屈原悲剧的象征核心是在这里。

我们时代的写作不再是自然的了，做作的、机心的写作，反自然的写作充斥着当代汉语，并且为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。

今天，道法自然是一种孤独、背时、保守的写作立场。它的悖论是，它是一种后退的、没有前途的、反先锋派、非主流的先鋒派写作。

我从自然领悟到人类心灵和经验世界的普遍性、普世价值。

道法自然，使我能够在世界中写作。而不是当代流行的“生活在别处”以及为了“与国际接轨”的写作。道法自然的写